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桑俊,陈华文,施爱东,等.“新文科背景下民俗学学科建设”丛谈[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5(3):29-53.

“新文科背景下民俗学学科建设”丛谈

导言

桑俊^①

(长江大学 人文与新媒体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3)

2021年12月4~5日,“新文科背景下民俗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与会学者围绕新文科与民俗学的发展机遇、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对民俗学的挑战、新文科背景下的民俗学与民间文学、学位制度建设对学科发展的影响、新文科背景下民俗学本科教育可能性与教学实践等问题各抒己见。此次会议是继2001年钟敬文先生倡议召开全国民俗学学科建设会议以来的又一次民俗学学科建设总结会。20年来,中国民俗学学科理论建设、队伍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民俗学学科建设与时代发展的历史机遇

陈华文^②

(浙江师范大学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所,浙江 金华 321004)

我们知道,人的一生实际上机会很多,但能抓住并且改变命运的大概只有两次。不能把民俗学比作人生,但抓住特别时期的机遇,对民俗学学科建设与发展会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这就需要民俗学学科所有同仁尤其是学科当中的重要学者共同努力,因为他们的影响力巨大。

一、党和政府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弘扬

很多时候,我们都非常关注现实的政治层面的

东西。我们知道,优秀传统文化的面是非常广的,这里主要举与非遗相关的例子,说明党和政府重视并积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地地方考察时曾多次为非遗项目和制成品点赞。这些非遗项目,我选取的都是跟民俗(广义的民俗概念)相关的案例,包括民间文学。

2016年5月24日,习近平在黑龙江同江市八岔村参观赫哲族民俗展,赞扬渔猎技术高超、图案艺术精美、伊玛堪说唱很有意味。2017年9月3日,习近平在厦门与普京会见后,参观闽南非遗展,介绍影雕工艺:“这些工艺师现在做的事情就跟绣花一样,但她们绣花是在石头上而不是在丝绸上。”2017年12月12日,习近平在江苏徐州马庄村考察,买了王秀英的中药香包,说“我买一个,捧捧场”。2018年2月12日,习近平来到成都唐昌街道战旗村,在“唐昌布鞋”展示台前,说“我花钱买一双”。2019年7月15日,习近平在内蒙古赤峰博物馆接见格萨尔史诗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并在观看演出后指出:“你们的演唱让我们感受到历史文化的厚重。56个民族不断交流交融,形成了多元一统的中华民族。我们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发展至今的文明。要重视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我们今天来看你们,就是要表明党中央是支持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2019年9月16日,习近平在河南光山县文殊乡东岳村接待中心为两名花鼓戏演员鼓掌。2020年3月31日,习近平来到杭州西溪湿地公园,途经本地特色文化产品摊位时,鼓励摊主要把传统手工艺传承好。至于总书记用中国茶招待外国来宾,更是长期在各种报道中可以见到。从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党对优秀传

收稿日期:2022-01-20

① 桑俊(1970-),女,湖北荆州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② 陈华文(1959-),男,浙江武义人,教授,主要从事民俗学、民间文学、文化学研究。

统文化中的民俗类是非常重视的。

党和政府重视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非遗的保护与传承,还体现在一系列政策法规上。

2005年3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确立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十六字方针。今天,《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依然适用。

2009年7月5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出台。

2011年2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该法自2011年6月1日起施行。

2015年7月11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

201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2018年1月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2021年4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该法自2021年6月1日起施行。

2021年8月1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把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生动见证,是连结民族情感、维系国家统一的重要基础。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还有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等等,在此不一一列举。我们可以非常明确地感受到党和政府对于优秀传统文化(其中也包括民俗)的重视,这对民俗学学科建设和民俗学研究是不可多得的机遇。

二、非遗保护为民俗学学科建设提供契机

从2005年开始,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正式开始。国内展开大规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持续并且不断深化这一工作,基本上是在民俗学(包括民间文学)基础上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它的学理研

究,项目程序的理论、历史和现实意义,价值功能跟生活的关联以及影响认同,等等,都与民俗学研究有着亲缘关系。

目前,非遗保护的国家级项目民间文学类有251项,民俗学类有492项。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我国有34项,其中18项与民俗学有直接关系。急需保护的名录有7项,绝大部分与民俗学有关。优秀实践名册只有1项,跟民俗学是正相关的。所以,绝大部分的人类非遗实际上是民俗或与民俗学研究相关联的。

当然,非遗保护,包括人类非遗名录以及国家各级非遗名录中的民间文学类、民俗类项目,并不能等同于民间文学或民俗。

非遗保护的项目制形式、民俗内容、叙事结构、仪式完整性以及项目确认过程中的一些特殊要求和规定,限制或影响了民俗存续期间的相关形式、内容或叙事,非遗项目更注重民俗的表演性或呈现方式,但有大量的民俗是与家庭生活相关联,以群体认同、个体实践的方式完成的,不具备表演或呈现的条件。所以,有很多民俗实际上没有进入非遗保护的项目范畴。

不可否认,非遗保护从根本上改变了民众和社会对民俗的认知,它从下层的世俗的一跃成为传统的民族的,甚至是独特的优秀的文化,在地方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等方面有着重要意义和价值。民俗学研究成为国家政治、社会、地方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为民俗学学科建设提供了重要机遇。

三、社会发展让国民重新审视民俗的价值

这一话题有很多关键词:“改革开放”“现代化”“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还有“城市化”“新型城镇化”“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世界经济一体化”“世界文化一体化”,等等。这些都为在传统农耕文化、游牧文化等基础上形成的民俗带来了巨大改变,国民会重新审视我们自己的传统。从改革开放到今天,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穿衣到饮食,从居住到出行,从语言到思维,从人际关系到沟通方式,从行为到价值观,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切促使人们去思考:“我是谁?我的民族文化是什么?我的国家与其他国家有什么不同?”这种回望和审视给民俗学的研究和学科建设带来了巨大的契机,“新文科”实际上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提出的。

四、学者的推动提升学科的地位和影响力

2001年,钟敬文先生敏锐地意识到社会发展给

民俗学带来的契机,在北师大召开了民俗学学科建设会议。当时的与会者是钟先生亲自提名或审定的,讨论也形成了非常丰硕的成果。可是,一个多月之后,先生与世长辞。20年之后回到原点,又在北师大召开民俗学学科建设会议,这让我们感慨良多。当年民俗学研究已经相对非常强大,今天民俗学研究成果更加丰硕,学科也在不断向前推进,影响力也在不断提升,出现了一大批在国内外民俗学领域有巨大影响力的学者,他们在各自的大学、研究机构发挥着重要作用。

现在社会学博士学位的授权高校,据不完全统计,我看到的资料是28所,民族学15所。28所当中多数高校实际上因为一级学科的原因,都有民俗学学位授权的权利,民族学里面也有这个内容,一级硕士学位授权点可能更多。当然,现在我们实行的是一级学位点的形式,不管是博士学位还是硕士学位,都是一级学科的授权方式,这方面的工作确实需要推进。博士学位授权点跟硕士学位授权点的数量非常多,从事民俗学教学研究工作的数量更是巨大。这些学者,他们在大学或研究机构中,一方面培养适应教学研究需求的科研和教育工作者,另一方面也参与社会治理、非遗保护各个层级的工作,包括保护研究、评审、咨询、政策制定,等等。我们要利用好这些学者的影响力并形成合力,推动民俗学学科建设更上一个台阶。

2001年,我们曾设想将民俗学建设成一级学科,更有学者提出民俗学是当之无愧的一级学科。钟先生提出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目前,从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来看,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在非遗学学科建设的同时,将民俗学这一具有非遗底色、特色的根基性学科建设成一级学科,包含民俗学、民间文学、非遗保护学、各民族民俗学、各民族民间文学五个二级学科,这样就可以构建起真正的民俗学学科,在新时代新文科背景下,完成蜕变和华丽转身。这是历史的机遇,也是民俗学学者顺应时代发展的选择。

学科发展与学术的自由生长

施爱东^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北京102445)

学科建设既是一个科学哲学的问题,也是一个

科学社会学的问题。所谓学科建设,大体上包含硬件建设和软件建设两方面。硬件建设包括学术梯队建设、人才培养、教材建设、机构设置,等等。硬件建设属于政府主导的,由政府与学界合力共谋的学术行为。民间文学或者民俗学是不是一门学科,要不要建设,基本由政府说了算。政府说你是学科,你就是学科;政府说你不是学科,你就成不了学科。从这一方面来说,我们的前辈学者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的学科建设思路主要集中在如何说服政府,让政府觉得我们是一门对于社会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学科,有建设的必要。

其实,这种学科建设思路到现在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是,这种思路基本是靠天吃饭,或许偶尔会有人工降雨之功,多数时候我们是无力回天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必然束手无策,人力还是可以通过筑河堤、修水库进行自我拯救的。我今天想说的是学科建设中的软件建设,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自我强化、内功修炼,从学术水平和学术影响方面来加强学术建设,这是只有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才能实现的。

我要与大家商榷的,主要是学科建设的软件方面,也即学术意义上的学科建设问题。从学术发展的角度来说,学科成立的前提有两个突出特征,一是范式特征,二是共同体特征。由于时间关系,我主要讲讲共同体特征。

在民俗学界,双栖甚至三栖学者特别多。比如高丙中,他既是人类学学者,又是民俗学学者,他在两边都很活跃;又比如陈泳超,他既是俗文学学者,又是民间文学学者;再如岳永逸,你说他到底算社会学学者、人类学学者,还是民俗学学者?我觉得都是。当他在民俗学圈子里面发言的时候,他就是民俗学学者;当他在人类学圈子里面发言的时候,他就是人类学学者。同样一篇论文,他发表在《民俗研究》,就是民俗学论文;他发表在《民族研究》,就是人类学论文。说到底,其实就是一个认同问题。人类学圈子可以认同岳永逸,民俗学圈子也可以认同岳永逸。可是,同样的学问、同样的论文,你把名字署上施爱东,人类学界就不会认。为什么?因为施爱东没有加入到人类学的学术共同体,他们对你不熟,不认可。所以说,所谓的学科认同,其实就是共同体认同。

^① 施爱东(1968—),男,江西信丰人,教授,主要从事故事学、通俗文学、民俗学史研究。

对于一个普通的学者来说,完全不考虑学科建设,他一样可以毫无阻碍地进入学术研究。有没有学科认同、共同体意识,与是否关注学科建设,是两码事。任何学术研究都是特定研究范式下的学术研究,而特定研究范式又是从属于某个或某类学科的,所以,学术研究一定是特定学科或学科类别的研究。

许多年轻人关注制度层面的学科建设,因为制度化的学科归属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学术前途,但是,说实在的,年轻人过于关注制度化的或者硬件的学科建设,除了迷茫、烦恼之外,不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或者说,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现在的学科建设基本上都是制度层面的学科建设,不要说年轻人无力回天,就算是学科评议组成员,比如说萧放老师这样大佬级的人物,也无能为力。所以,我们对制度层面的忧虑其实都是杞人忧天,我们只能从学科共同体的角度来谈软件建设。

先说学科体系。我觉得钟先生在学科体系的建构上是有一些失误的。民间文学的学科体系,基本上是以研究对象为学科格局的结构体系,在民间文学的大框架下面,分为神话学、史诗学、传说学、故事学、歌谣学,等等,这种对象体系本质上是一种认知体系,不是研究体系。使用这一体系来进行认知教学,让初入门径的学生知道什么是故事,什么是歌谣,什么是传说,这些知识是有用的。但它不是研究体系,难以深化我们对于民间文学的认识。比如说,我们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去辨析什么是故事,什么是传说,故事和传说有什么区别,但事实上所谓的传说和故事,不过是学者的建构而已。也就是说,我们只是为自己的建构而建构,这样的研究成果并没有对整个民间文学研究的深化做出实质性的贡献,没有对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做出有益的贡献。这些知识是一种封闭的内部知识,一旦放到民间文学学科之外,就没有任何价值了。所以,我觉得这种对象体系的学科体系,本质上只是一种认知体系,不是研究体系。

还有一种我认为基本上没有太大价值的研究,就是价值研究。我们在对课题项目进行论证时,常常会以对象价值来论证研究工作的价值。上世纪80年代,我们总是用劳动人民的伟大来论证民间文学的伟大,再用民间文学的伟大来论证民间文学研究的价值。这种价值论证对于其他学科来说,对于整个大文学,或者说整个社会科学来说,几乎没有推动意义。你整天说我怎么样,或者我这个学科怎么样,事实上,你只是在论证你自己,对于别人来说是

没有意义的。每个学科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论证自己。问题是,你天天说你有多漂亮,这对于我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到了21世纪,我们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来论证非遗学的价值,然后,通过民俗学跟非遗的关系来进一步论证民俗学的价值,思维方式还是上世纪80年代的方式。且不说对象价值与研究价值并没有必然的相关性,就算有,这种自我论证也并不能用来提升民间文学或者民俗学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因为这样的论证对于别人来说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没有大文化意识,不知道别人关注什么话题,需要什么知识,我们没有为大文化输送一些我们创造的对别人有用的知识,而是关起门来讨论自己的问题。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们还有一个失误,我认为也是钟先生的失误。一直以来,我们的学科建设都是基于计划体制的蓝图规划。钟先生认为民间文学作为一种学科体系,它应该包含六个方面,他在谈到民俗学学科建设的时候,建设思路基本上也是这六个方面。也就是说,这其实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适用于所有同类学科的蓝图规划。把它拿到人类学或者其他同类学科,似乎都是适用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刘宗迪的关键词替代法,如果你提出一个命题,将命题中的关键词替换为其他关键词,如果命题依旧成立,这个命题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价值。

任何学科体系都是与时俱进的动态体系,不是一成不变的静态体系。所谓学科界限,其实是学术共同体的自我设限,一切限定都是学术共同体自己制定的。无论我们用圈地的方式来搞学科建设,还是以蓝图规划的方式来做学科建设,在实际研究中都是一种束缚。事实上,对于那些具有创造性思维的学者来说,只要这条界线或者说这个蓝图困扰了他的具体工作,他自然就会选择突破这些束缚。所有研究者其实都是受到现实利益驱动的,或许有个别学者会说我是为了实现钟先生的宏伟蓝图而从事某项研究,但是,这种利他的驱动对于群体是无效的。事实上,每一个学者都会根据他自己的条件和处境,选择从最利于学术发展的角度来从事学术研究。也就是说,你的规划永远对我不适用。钟先生在世的时候,你按他的规划走,很可能会更容易拿到课题,得到赞扬,但钟先生去世之后,你既拿不到课题,也得不到鼓励,你还会照着这个规划向前走吗?

既然认知体系和规划体系都不是研究体系,那

么,民间文学到底研究什么呢?有时候,我们想清晰地明确一些概念,比如,什么是民间文学,什么是民间文学研究,具体的领域边界在哪里,等等。但是,有些时候,有些事,我们真的不需要清晰的界定,意会知识就足以引导我们前行。许多概念就算是没有明确的定义,只要大家能够意会得到是怎么一回事,其实就可以进入研究了。元素周期表发明之前,化学研究不也一直在前进吗?

很多新生事物、新领域,都是前人所无法预料的,比如说现在的网络民间文学,比如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等,这些东西在钟先生的时代他完全无法规划,甚至都无法想象。所以说,所谓的学科蓝图基本上是没用的。许多学者,尤其是一些著名学者,他们总是很热心地为我们指明学科发展的未来方向,但是,我觉得这些规划蓝图基本上无法落实,也没有多大意义。

既没有蓝图,也没有规划,我们的学术还能如何进行?其实非常简单,在现有的学术框架内,基于已有的研究范式,每一个学者都充分发挥自己的强项,从现实需要出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觉得什么东西可以做,就做什么,觉得哪些问题需要解决,就去解决哪些问题,以解决问题为目的,从现有的理论和实际条件出发,自由发挥,自由生长,努力把问题解决得漂亮。学术研究贵在自由,你给它自由生长的空间,它自然就能够向上生长。

如果说有了自由的空间,就能够向上生长,那么,学科还有什么意义?大家为什么还要受到学科的束缚?首先是因为学术研究需要范式的指导,特定的学科能够为我们提供特定的研究范式,提供我们需要的理论操作工具。其次,学术研究的价值需要在学科共同体内得到承认,只有相同研究范式的人才能理解、接受、传播你的研究。

学科就是一个共同体,共同体成员通过相互讨论、相互推动,能够从无序生长的各种各样的话题里面提炼出一些大家共同关心的话题,这些话题很可能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通过共同体内部的学术对话,人们就会自然聚拢到一些大家共同感兴趣的话题上来。那么,这个焦点如何找到呢?话题的产生是无序的,但是通过学术对话,会自然形成优胜劣汰,有意义的话题会脱颖而出。这就像下雨一样,云本是散漫无序的,但总会有一些凝聚核能够将部分

云气凝聚在一起,最终凝成水滴,形成雨。雨降到地上,水往低处流,自然就形成了沟渠,流向小河,再注入大河,奔向大海,这是自然形成的,不需要人力规划。所谓学科发展,就是这么发展的。

学科是个抽象的概念,事实上是由我们每一个学科内的具体成员组成的,相互之间不断对话,比如说,萧放老师组织的学科建设讨论会,就是一个公开的对话平台。大家各自在做些什么工作,各自的想法是什么,彼此是不大清楚的,但是通过会议,我们就知道了郑土有老师在做什么,萧放老师在做什么,谁又在做什么。我们也在关注和衡量哪些是我感兴趣的话题。王晓葵老师关于灾难民俗的研究很有意思,既有现实意义,又有现成的研究方法,加上王晓葵又在鼓动大家一起来做,他自己还主持一份刊物,方便成果的发表,于是,有一批人就跟进来了。这就像我刚才说的,一些水自然地流进了小溪里面,它可能在某个地方又跟另外一支汇成了河流。

其实,从软件建设的角度看,学术自由是最可贵的,在自由的基础上展开学术对话,在对话的基础上形成共识,在共识的基础上促进学术的发展和学科建设。当然,这里所说的学术自由,也是戴着镣铐的舞蹈,是在特定学科范式基础上的自由。学科建设既有赖于研究范式,也有赖于共同体的建设。学科建设需要对话平台,需要会议,需要我们互相引用、互相批评,共同提高学科的影响力。

当代民间文学界对民众主体性的重构

陈连山^①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一、《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工作原则从理论上再次肯定了民众主体性

学科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其实是社会需要,这不是学者个人的爱好趣味能够决定的。民俗学的存在与发展符合中国新文化运动与现代社会的需要,它是逐步建立发展起来的。如果没有新文化运动,没有现代社会,中国民俗学其实是不可能发展的。

民俗学学科要发展,它不光基于客观的社会运动本身的需要,还基于我们这些学科从业者如何理

^① 陈连山(1963—),男,河南洛阳人,教授,主要从事民间文学与民俗文化研究。

解新文化,如何理解现代社会需要。我们究竟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文化,什么样的新社会?这一点如果我们这些从业者没有想好,那么我们是无法顺应社会需要的;无法顺应社会需要,我们的学科就没法发展了。所以,民俗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基于我们这些人对于新文化和现代社会的理解。我认为民俗学、民间文学研究的核心是民众的主体性问题。

民俗学、民间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对待民众,其实就是如何理解民众主体性的问题。中国民俗学、民间文学搞了一百多年,其实这一百多年的经历证明了在不同时期学术界对待民众的方式是不同的,取得的成绩不同,遇到的问题也有差异。

我现在所概括的这个时期,就是改革开放以后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民俗学学界对民众主体性的认识跟以前是有变化的,我们对民众的主体性进行了重新的肯定。

《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确定的民间文学工作基本原则是所谓“三性”:科学性、全面性、代表性。这“三性”其实体现了新时期知识分子对民众的一些新的认识。我按照当时对“三性”的解释进行阐发。科学性,我们讲的其实就是忠实记录的原则问题,这跟五四时代确定的忠实记录原则很接近。忠实记录,或者说讲究科学性,其实就是尊重民间文学作品本身,这背后是对民众主体性的尊重。全面性这一点更加重要,过去虽然也讲全面搜集,也讲全面性,其实真正做起来还是部分地抛弃了很多不符合政治需要的作品,等于是按照政府的需要,按照官方的需要,或者按照主流道德的需要来评价民众作品,判断民众作品,这是对民众主体性的一种损害。《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虽然也不能完全摆脱政治或道德的影响,但比过去改善了很多。代表性主要是指入选作品能够代表地方文化,或者某种地方文学形式,在有限的篇目范围内尽量充分地展示民间的文化面貌,反映其特殊的文化价值,而不是考虑它是否具有普适性。

我对“三性”原则的解释可能有点理想化,《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编辑操作过程中也存在一些政治性的解读。但是我从概念上来理解,能够把问题看得更清楚一点。“三性”原则不仅仅是具体的操作规范,它在理论上重新肯定了民众的主体性。所以,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不仅在规模上,也在质量上取得了成绩,这就为我们后来的民间文学理论反思奠定了比较可靠的基础。

二、民众概念的扩大与民众主体性的终极形式

五四以来,其实启蒙主义话语中民众概念一直是不断变化的。最初的概念是跟“官方”和“知识分子”对应的社会下层平民,这里当然包括了乡村地主和城市小业主。1949年以后,适应阶级斗争理论的需要,民众概念非常狭隘,专门指体力劳动者——劳动人民,而且赋予这个概念很强的政治意义。

按照这种旧的民众的概念,现在我们的研究对象是不断消失的。随着民间文学作品和民俗的不断消失,民俗学、民间文学学科就面临着研究对象缺乏、自身合法性不断消解的危机。

因此,在上世纪90年代,我们接受了美国民俗学家邓迪斯的民众概念:任何社会群体,或者两个以上的个人之间只要拥有共同的民俗,那么他们就是民众。这个概念体现了一种新的可能性——我们可以不再用社会地位来定义民众,而是用文化形态来定义。你有这样的文化形态,你就是民众。这个概念产生了很大影响。

第一,它扩大了民间文学的范围。随着民众概念的扩大,过去很多被忽视的社会群体的口头文学受到关注,比如大学校园的各种“段子”,王娟称之为“校园民俗”。知识分子的口头文学也是民间文学。这样,民间文学研究就摆脱了研究对象不断消失的危机。第二,从理论上讲,新的民众概念指向所有的社会群体,指向每一个人,民间文学就成了所有人的文学。过去一直威胁学科存在的力量,即所谓民间文学是比较低级的,民间文学不够高级,这样的问题就解决了。当民间文学是每一个人的文学的时候,歧视民间就隐含着对自己的歧视。它突破了五四以来启蒙主义话语的基本框架,就是把民众和知识分子相互对立这么一种二元模式,把社会区分成精英和民众这样一种二元社会,这就落实了民众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平等。

这是中国民俗学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启蒙民众,用西方现代文化观念改造民众。我认为这种启蒙做法是有问题的,这里不深谈。知识分子启蒙民众这个模式存在的逻辑前提就是民众和知识分子要被彼此区分。1942年以后,倡导知识分子向民众学习,向工农兵学习的模式,五四时代的启蒙模式丧失了继续存在的逻辑基础。现在,我们认为:知识分子跟民众是平等的,双方是社会同时需要的两种民众群体。

当我们在学术研究和实践中发现民众就是我,我就是民众的时候,人人自由平等的思想才真正在我们的学术中扎根。民众的主体和知识分子的主体融合成为一个既抽象又具体的人的主体。民众的权利就是知识分子的权利,知识分子的权利也是民众的权利,二者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民间文学研究或者民俗学研究,其实就是知识分子与民众主体之间的对话,是两个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主体之间的对话。这就是吕微先生所谈的“主体间性”。主体间性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发起的思考,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个核心理论概念。吕微的论述从主体性发展到主体间性,这是民俗学界的贡献。

我所理解的启蒙,就是每一个人都自由而公开地使用自己的理性。在这种思想烛光的照耀下,社会地位的差异,知识水平的高低,文化文学形式的新旧,这些问题都会淡化以至于消失,民间文学研究面临的一些障碍就可以除掉。

三、民众的创造力

我们过去讲民间文学是传统的、集体的文学,作者佚名或者匿名,这种做法忽略了民众的创造性。现在,我们通过田野作业、表演研究发现,民间文学的每次传承都是再创造。这些演唱者、讲述者,他们每次的演唱和讲话都是再创造。现在出版了很多民间文学传承人的个人作品集,我们无需担忧民间文学会消失,虽然有些作品会消失,但是新的民间文学作品将随着生活的变化,不断被民间文学家重新创造出来。

总之,我们过去理解的民众是需要知识分子来教育的,包含着知识分子的优越感。我们需要一个正确的文化理想,我们要更好地、更深地理解什么是现代文化,什么是现代价值观,我们究竟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我们从事民俗学研究,需要和这个文化理想、社会理想相适应。具体的目标是让每个人都幸福,让每个人都能够幸福。既然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存在,所以未来的文化应该是多元的。为了实现这种多元的文化,我们应该充分尊重民众的主体性,尊重他们的文化权利。也许他们的社会地位是比较低微的,文学趣味还是下里巴人,但是假如他们被改造,那么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也必然会被改造,

因为我们也是其中的一员。

民俗学的终极关怀是促进建立一个全体成员自由创造、平等相处、相互关爱的社会。尊重民众,就是尊重我们自己;尊重民众的文化权利,也就是尊重我们自己的文化权利。倘若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能帮助建立起这样的社会,那么这个学科即使很小,也仍然不失为一门伟大的学科。

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的新民俗学学科建设

高丙中^①

(北京师范大学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与发展中心,
广东 珠海 519085)

我今天主要还是想讲讲民俗学的学科建设。讲民俗学的学科建设,很容易进入我们多年来一直在说的那个学科建设的路径里面去,实际上,我今天要讲的学科建设并不是我们以往所讲的学科建设。在新文科背景下,我们讲民俗学的学科建设,一定是新民俗学。并且,新民俗学是我们必须要提出来的,因为新文科建设造成了这样一个局面,即所有的文科学科都被迫来重构自己,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原来我们讲学科建设,主要是说我们这些小学科对自己比较弱势的学科地位不服气,要改变自己在学科体系当中的地位,但是努力的结果并不如意,新文科则是让所有的学科都必须重新自证。这实际上就是说整个文科或者中国整个的学科都要重建。

所以,我就在两个层次来讨论这个问题,一个是学科制度,另一个是学科之间的等级制度。

中国整个的学术、学科制度要重建,就不是我们这些小学科要在原来的结构中有一个什么位置,而是在推倒重来的大格局下,别的学科有机会,我们也有机会。这个机会跟我们前些年要争取成为一级学科,不甘于在社会学或文学下面做二级学科,是不一样的。

我想,第一点是因为新文科势在必行。每一个具体的学科都必须在新文科的学科框架下建设成为新社会学、新民俗学、新历史学,而不仅仅是某一个学科单独的事儿。那么,为什么这是一个不得不做的事儿?因为,时代变了。

我们今天很容易对新时代不太敏感,可能还是由于对我们所属的时空有不同的认识。实际上,我

^① 高丙中(1962—),男,湖北京山人,教授,主要从事文化人类学、民族志方法、民俗学理论、社会组织和非遗保护研究。

们完全需要对此有一个新的认识,认真地对待我们所说的新时代,从学术上反复强调。今天我们在学术上说的新时代,是指由于技术,各种各样的新技术——数字化、人工智能、即时通信工具——正在发展出各种各样的新事物,新的基础设施覆盖了全世界,它有能力在空中为人们提供交流的工具。它带来这样一个变化,不是说这个社会在经历一个不同的时代,而是说人作为一个“类”,处在一个新的时代,人正在成为一个跨星际的生命。

现在的学科制度是工业时代社会分工的结果,是所有社会分工的一种。当然,它没有能够善待前工业时代的事物,所以我们今天搞了很多文化遗产保护,实际上就是在弥补工业时代学术和学科所留下的问题。这些年,大家通过后工业时代、信息时代等概念来说明社会所发生的变化,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变,而原来的学科分工仍然主导着学术和学科体制,这样的学科体制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我们说学科体制有问题,这是很自然的。

回到民俗学,民俗学在当代本来有两次挺好的发展机会,但是最终没有能够像我们所预期的那样,当然并不是因为我们的预期太高,而是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我们提倡民俗学在社会科学里面应该有一个新的位置,这是从中国社会,或者说中国社会与世界社会的交流来考虑的。民俗学是一个小学科,当然也是一个边缘学科,这是与中国社会科学共同体中人们的学科认同联系在一起。在中国现代民俗学建立的过程中,有人加入,也有人退出,这些共同构成了民俗学的现状。民俗学为什么只能是一个小学科?因为在西方发达国家,当民俗学兴起的时候,工业社会是它所面对的主体社会,而它本身却对应着前工业社会的文化遗留问题,所以它自然就是一个边缘学科,就是一个小学科。当它传到发展中国家时,虽然发展中国家还是前工业社会,但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形成的学科结构在相当程度上主导了全世界的学科体制,因此最后它在发展中国家仍然走了小学科、边缘学科的路子,还是工业时代的学科分工的产物。所以,在这个学科结构里面,已有的整体的学科体制对它有所限制。另外,民俗学进来的时候,最初参与其中的很多重要的文科类学者后来之所以还是归到别的主流学科里面去,最基本的还是“民”与“俗”在中国走向现代的过程中没有取得重要的地位。

新中国建立后,“民”和“俗”旧有的形式其实是没有地位、没有价值的,因此它必须变成新秧歌、新

民歌、新故事,变成群众文艺,才能在社会里面、在体制里面有位置,这个时候当然不可能有独立的民俗学了。

改革开放后,民俗学重新恢复的过程中有两次发展机会。第一次就是民俗复兴。尽管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民俗文化大量消亡,但是民俗复兴的潮流遏制了民俗的消亡。后来,非遗保护的兴起再一次阻止了民俗的迅速消亡。实际上这两次社会运动都给民俗学带来了重要的发展机会,民俗学在其中获得新的生命力,真正成为中国学科制度中的一门学科。

从全世界来说,民俗学还是可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但是,目前的学科制度是民俗学发展的天花板,因为作为一个边缘学科、小学科,在现有的学科结构里面,它的机会是受限制的。在高等教育中涉及学科发展的政策投票时,支持民俗学发展的票数远远不够,在整个国家的学科制度制定中,能够支持民俗学的委员数量也不够。总而言之,就是民俗学的声音不能够被认真听取,在决策过程当中投票的票数不够,这就使得民俗学难以获得应有的学科政策支持。

学科制度是天花板,因此也是必须要突破的东西,我在这里对中国的学科体制有一个反思。我把它看作工业时代学科分工的产物,它不适合于现在,这是基本的看法。具体来说,它是基础教育中文科和理科之间的分别,所以文理科分别之后,基础教育就是纯粹为文科发展培养人才,这对于民俗学这类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来说,确实是不合适的。

上面是从学科制度的角度说的。下面从学科之间的等级制度来说。

现在院系是按基础学科设置的,民俗学不是他们认为的基础学科,当然就没有院系。在院系里面,按照院系的逻辑,小学科是发展不了的,这一点在院系工作的人都是感同身受的。此外,我们的学术分工是非常典型的中国学科研究的分工。很多学科是从西方引进的,虽然可能主要是研究自己社会的,但是由于需要国际视野,因此就搞一个国际分支单独做这块儿,实际上大多数学者只在国内做调查研究。

那么,新文科建设的要点,就是解决面临的这些问题。我们今天比之前更有热情、更有信心让一个新民俗学在今后的综合学科中有不一样的结构位置。我觉得这个机会是存在的。

整个文科体制要被重构,当然,民俗学本身也要重构。在这样的两个重构里面,实际上所有学科都

有机会,并不是只有民俗学有这种机会。在这样的一个重构当中,我刚才讲的所有的学科都必须是“新××学”——新社会学、新政治学,当然也包括新民俗学。比如说在社会学院,不仅仅是重构民俗学,使之变成新民俗学,社会学也是新社会学,所有这些原来的结构都要重新靠自己的学术创新,实现学术共同体的自我认同。

这一方面是时代的选择,另一方面也是靠我们自己来做选择。这一点我们做民俗学的人是非常熟悉的,其实就是学科史中所讲的新文化。当“新文化”这个概念被提出来的时候,原来是文化的东西就不再是文化,因为你必须重新证明自己。民俗学就是非常典型的被否定的文化,因为它是生活文化,新文化概念提出来之后它就变成了旧文化,因此必须通过改造自己来适应新社会的要求。比如说白毛女等民间故事,都必须经过这样的转变。

我前面讲学科是有机会,有空间的。接下来,我想讲一下民俗学如果在新的时代,它在内容上靠什么有机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传播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民间生活文化或者民俗经过特定的程序,进行特别的价值认可之后就成为了非遗。在这个过程中,“民”的地位和“俗”的地位,在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当中都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这个结构性的变化是绕不过去的。

我想在这里举两个例子。

一是在政治上,老百姓总是需要自证其价值观的正确性,但是他们没办法自证,因为这是精英主宰的表述体系。有一些民俗学的人帮他们自证,但是受限于整个的意识形态,不能够做出符合主流价值观要求的革命性的表述。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盛行之后,民众的日常生活变得具有价值,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因为在原来的民俗概念中,民俗的主体是落后的、愚昧的,因此也就没有正当表达的机会。

二是在经济上,在现代消费社会中,每个人都是潜在的消费者,企业需要正面地看待不同人的需求。你要烧香,他就愿意给你生产香,那种比较好的香非常昂贵。就是说,对于消费社会的大众,企业是无条件地认真对待其需求的。

这样一些根本性的变化——“民”在新时代确立了其基础性的地位——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不管政治经济还是其他方面,逐渐得到确认,并且是被整

个学界认识到,同时也开始更认真地对待。民俗学可以在这里面起一些推动作用。

民俗学在这样的条件下逐渐成为中国的公共知识,在学科体系里面才可以成为新的基础学科。新民俗学在这样的意义上就超脱了原来的小学科、边缘学科。在新文科这样的新学术结构体制中,在所有学科都要重新建构自己的背景下,民俗学获得了发展的机会。

我讲的这些都是理论上的可能性。最后,我想说,民俗学发展的机会和条件是具备的,而它真正变为现实,有赖于全体民俗学人的努力。如果能够这样,那么,民俗学接下来不论是继续朝着基础学科发展还是朝向应用学科发展,所有的可能性都是我们的可选项,这样,最终的选择权就在民俗学人自己手中。

研究自觉与逆向思考

——关于新文科背景下民间文学学科建设的思考

康丽^①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新文科背景下的民俗学学科建设”研讨会,不仅提供了一个平台,让各位同仁进行观点的互享,而且创造了一个开端,让大家可以将自己的学术研究放到学科建设的框架下,甚至超脱出学术与教育的体系,放在社会发展的框架下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

与前述的讨论略有不同,我们这个时段进入到民间文学学科建设的讨论。相较于前,我个人以为,在新文科的背景下,这个问题会变得更加复杂。因为这不仅涉及对民间文学作为独立学科必要性的思考,还要关联到它与民俗学,现在正处于热议阶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等平行学科的关系,乃至它如何协调并适应当前新文科建设的需求等问题。就这样一个时段的主题,我想简单谈两点。

一、民间文学学科建设中的研究自觉

前面的讨论都关系到当代学术体系中的一个经典问题,即如何理解主体与学科的关联,且恰好分别侧重了对民间文学学科建设至关重要的两个群体:理论生产的共同体与文化持有群体。施爱东研究员对前者的讨论,关心的是理论生产的主体建构学科

^① 康丽(1974—),女,北京人,教授,主要从事民间叙事、民俗学理论、社会性别研究。

共同体的必要性与途径。陈连山教授对民众主体性的强调,则关系到民间文学的学科立场,即如何理解生活世界中知识生产主体的构成,以及如何理解研究者与文化合作者之间的关系。无论关注的是哪一个群体的主体性,我个人认为,这对民间文学的学科建设来说,都是一个老生常谈却常谈常新的重要问题。

回顾民间文学学科的发展历程,我们会发现学界对主体的关注经历了一个由侧重结果向关注过程的转向,即从对文本的坚持,到发现文化主体的实践对文本形成的重要影响,再随着对语境、过程视角的接纳,开始反思主体与文化空间的相互生产。在这样一个渐进的转变中,民间文学学科似乎是慢慢走向了文化中的主体,但随着文化现实的日益复杂,在面对主体异质性的挑战时,我们也遇到了迷失方向的危险。比如当我们已经认知到研究者在场会对民众(我们的合作对象)的知识生产造成影响时,如何思考并应对伦理问题带来的挑战?怎样认识个体主体跟群体主体之间的复杂张力?如何理解异质主体在学科建设中的相互关系?

在思考上述问题引发的主体论争时,无论是在思考的视角上,抑或是在分析的方法上,我们能窥见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对民间文学研究的影响。受益于其他学科的贡献时,我们也需反问自身,民间文学这样一个已经有百年积淀的学科为其他学科、为人类社会的运行提供了什么呢?这里牵涉到的不仅是对既往发展历程的总结,也关系到一个学科建设过程中学术共同体如何构建自身研究自觉的问题。

截至目前,参与此次研讨的同仁们对民间文学学科当下的发展是具有共识的。回到此次会议的主

题,就我的理解,新文科建设在价值导向、融合手段、研究范式上的求新,其本质是鼓励具体学科在知识生产过程中,能自觉地与其他学科进行临界或跨界的协同合作。从这样一个视角思考民间文学学科未来的建设方向,我们至少要回答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在学理层面上,民间文学的知识生产在多大程度上能主动超越经验研究进行范式反思与理论体系建构,为其他学科带来具有可持续性发展动力的学理贡献?二是在公共履职层面上,民间文学的学科实践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应对人类思想创造的成就,自觉地为生活世界不断变迁的时代需求提供支持?

在既往的学术和社会实践中,我们能看到前辈与同仁在回答上述问题上的努力。比如,近年来学界对民间文学遗产化进程及其保护趋向的讨论^①,对民间文学传统介入灾害、养老等社会问题的思考^②,对都市化进程中趣缘群体的形成及其传统生产的理解^③,对媒介技术影响传统传承,尤其是重构年轻一代生活世界的认知^④,都是学科直面现实需求的成果。但回到民间文学学科的建设问题上,我们当下对学科发展的焦虑,不只是因为学科建设要应对来自国家与社会时代需求的挑战,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以往的实践成果尚未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究其原因,是我们的学术共同体“经世致用”、适时而动的热情与积极产出居多,但在整体上,为适应国家需求、满足民众期待而主动进行学科理论体系建构的研究自觉不够。

二、遇热逐冷:学科建设中逆向思考的重要性

关于新文科背景下的民间文学学科建设,我尚

① 民间文学界十分关注民间文学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地位与发展,如郑土有:《民间文学的遗产化保护》,《光明日报·文史哲周刊·文学遗产版》,2020年4月13日;林继富:《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化传承的基本遵循》,《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② 萌发于21世纪初期的灾害民俗学,是域外都市民俗学与公共民俗学的转型产物。王晓葵在推动中国灾害民俗学研究的过程中,强调运用灾害民俗志的方法记录灾害常识体系,让“‘事件’通过记忆转换成‘传承行为’,而成为民俗学关注的对象”,这样,“民俗学就有了关注灾害这样的社会重大问题的契机”。见王晓葵:《灾害民族志:灾害研究的民俗学视角与方法》,《民间文化论坛》,2019年第5期。王晓葵、李唐:《因忘记而发生 中日地震灾害记忆有何不同》,《世界博览》,2020年第20期。

③ 详见徐贲丽对都市新兴趣缘群体的讨论与当代都市民俗学研究的思考。如徐贲丽:《当代中产阶级消费品味的制造——基于网易严选文案的文本分析》,《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建构城市生活方式:上海近代文明化及其动因》,《民俗研究》,2020年第5期。

④ 详见杨利慧对神话主义现象的关注与对神话资源转化的讨论,如杨利慧:《神话主义研究的追求及意义》,《民间文化论坛》,2017年第5期;《民俗生命的循环:神话与神话主义的互动》,《民俗研究》,2017年第6期;《中国神话的创造性转化研究》,《文化遗产》,2021年第2期。

未形成系统深入的思考,但有一个来自研究者的本能意识,就是要“遇热逐冷”。这个“逐”是追逐而非驱逐。我还记得在求学期间,钟敬文先生常说做学问要耐得住性子,坐得住冷板凳。他强调的是耐冷的韧性。可就像诸位老师都提到的,当下的社会现实变了。国际社会对文化保护与交流的倡导、国家发展的需求与民众受益的期待,共同促成了包括民间文学在内的优秀传统文化保护的热潮。在这样一个热情的时代,我们有投身热潮的动力与勇气。但越是在这样的时刻,越是需要冷静的思考。这也是学科建设中逆向思维的重要性。

从宏观层面看,这种具有自觉意识的逆向思考应当表现在如何理解“新”与“文科”之间的关系,即在学科交互协作的框架下,如何理解新文科建设中文科的质性?在传统人文学科的研究中,质性研究是相对于量化研究的一种方法,主要是通过深描文化事象的发展过程及其特征,对主体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以洞察研究对象的本质和演变规律。^①在新文科的建设中,多学科临界与跨界合作的基础是文科研究的基质。此处提及文科的质性,是想强调新文科建设中要权衡好新与旧的张力关系,不应一味求新而忽视文科的本质。新文科的根本是文科。如果说新代表着“术”与“用”的更新,那么,文科应当意味着人文研究“道”和“质”的坚守。新文科的最大特点是文理交叉,那么,在新文科建设中把握文科的中心地位,以此为基础,做好“道”“质”与“术”“用”的兼容,就显得尤为重要。

我觉得在这些问题上,与会诸位老师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比如今天两位引言人讨论的民间文学研究的主体问题,就是民间文学建设过程中应当坚持的重要的“道”与“质”。在我看来,需要在热潮中进行冷思考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能在新的社会需求与学科壁垒面临解构挑战的当下,凸显对“人”认识的深刻性?现在处于热点位置的数智人文研究,若脱离了主体的人文关怀与情感记忆的视角,可能亦无法追求技术与知识产出之间的关系本质。

具体到微观层面,这种具有自觉意识的逆向思考应更多地表现为,在民间文学的学科建设中,如何把握学科本位,以及由之引发的学科保守性和新生性的问题。比如,如何权衡学科边界的确立与消融

的关系?怎么认识民间文学学科的独立性及其与相关学科共生的关系?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学界共同体能将自觉的逆向思考具化在每一个研究实践当中,通过从事基础性研究、应用性研究与批判性研究的同仁通力合作,才有可能完成。

回到新文科建设的框架下,无论是正向的推进还是逆向的反思,民间文学的学科建设,要求我们真正做到在微观学科认知与宏观体系需求之间“跳进跳出”、逡巡反复,创建出属于民间文学的学科想象力。这不仅仅是情怀的问题,也是光荣的责任与义务。

新文科背景下民俗学学科建设的困境与出路

李永平^②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感谢北京师范大学组织这次学科建设研讨会,我一直在认真听大家的高见,的确受益匪浅。联系陕西师范大学民俗学学科的情况,我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首先,我们学校从建校以来,民俗学研究队伍就一直存在,而且,这几年随着几位新老老师的加入,大家做了许多的工作。比如在扶贫攻坚方面的文化扶贫、社会服务方面的非遗传承人培训等工作,得到了社会充分的认可,有了国家级协同创新中心、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等平台。2017年,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成立了民俗学与民间文学教研室,目前的建设任务还是比较繁重的。

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被确定为世界一流建设学科。民俗学学科建设今年才完成,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底下,目录外自设了硕士和博士点。自设的过程中,社科院、复旦大学的老师包括张士闪老师都给予了大力的支持。自设点叫民间文学与文化,设立了民俗学、文学人类学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三个方向。学科面临的问题是规模比较小,队伍建设缓慢。

接下来,我谈的问题就是新文科建设中的民俗学和非遗研究。

① 徐飞:《新文科建设:“新”从何来,通往何方》,《光明日报》,2021年3月20日第10版。

② 李永平(1970—),男,陕西彬县人,教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文学人类学、俗文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神话与丝绸之路史研究。

从学术研究角度来说,我觉得民俗学是天生的跨学科,是后学科时代的学术增长点之一。高丙中老师、郑土有老师、张士闪老师都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这在学术研究上是有明显的优势的。民俗学、人类学、考古学学科交叉,优势更明显。我举个例子,比如人类学过渡礼仪中的阈限状态,也就是过渡、边缘、未定状态,文学叙述中的通道、门、门廊,正好就类似于过渡空间。门、门廊、门槛意象在文学作品里非常多。跨过门槛,就是将自己与世界联系在一起。民间文学里边有特殊空间,门槛、门廊的时空禁忌,小红帽中的关键情节就是“敲门”,门是安全世界和危险世界的分界,敲门就是阈限性的行为。人类学和民间文学、民俗学的关系非常密切,这是民俗学、非遗学术研究的优势。

从刚才举的学术研究的例子我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聚焦学科秩序演化的节点,民俗学恰好就是各个交叉学科的一个节点,所以它有孕育功能。但是,孕育以后,一旦“诞生”,身份就要清晰。文学人类学从历史边缘、附属、间隙、未定等地带发掘出人与物的“叙述节点”,即阈限书写。文学人类学中的“阈限性”指涉神话叙事中的时空迁移、民俗仪式活动中的身份转换和族群认同中的边界效应。阈限让我们关注演化的节点,节点时间、特殊空间、演化分差、身份和转化。

接下来,也正是因为阈限,问题就出来了,我称之为阈限视角。目前,学科行政管理对深化学术研究和科学进步、学术创新的桎梏越来越明显。学科本位意识造成自我局限和他者设限,民俗学深受其害。就是自己的认同老是出问题,再就是其他人对这个学科不认同,或者有一些建设上的误区,阈限状态最终身份模糊。这既是好事情,又是个大问题。因此,这个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的会议非常重要,就是讨论和思考身份问题,包括个人身份、学科身份与身份认同。

前面几位老师都提到,目前高校运行始终无法摆脱学术研究之外的学科体制、学科等级的问题。学科之间的等级制,院系运行、行政运作的逻辑,使小学科发展受限,我的感受比较明显。

比如,招生的时候按学科大类招,民俗学知识在考题里面体现不出来,换句话说,招来的研究生是零起点。再就是报考的学生比较少,民俗学学位论文

送审时,评委规模比较小。此外,由于研究人员分布在不同的学科,往什么学科送审,也是个问题。项目申报也存在问题,评审专家比较少。评奖的时候往哪个学科去报,同样存在问题。评审人员里边民俗学的专家学者比较少,导致外行评内行。放在各学科里边去评,可能会造成好多评不上。还有人才队伍建设,小学科、边缘学科可能不太受重视。从学者的角度来说,大咖和青椒的感受不一样。大咖因为其本身的影响能成就一个学科,可能感受少;但青椒的身份认同就存在问题,尤其是在文学院,在社会科学学院或社会学学科里边做民俗研究,面临的问题不少。一些学术传统悠久的高校,像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问题可能少一些。新学校面临的问题则多一些,变动多一些,认同就会有一些问题。

最后,我讲一下出路,前面几位老师也都谈到了。学科建设方面,要抓住新文科建设的机遇,以国家级平台为基础,力争把民俗学建成真正的一级学科。社科院、北师大、山东大学、中山大学这些机构和学校要带头。目前,民俗学作为二级学科放在社会学里边,给在文学院从事民俗学研究的人带来了一些困扰。在学科体系里,学科身份要清晰,我们不能完全改变学科体制的现状,但是,在这种框架里面我们要争取话语权。民俗学可能以后会成为新一轮新文科建设的一个增长点。

我的想法是加强学科共同体内部的整合与认同。在学科共同体内部要认同,加强合作,扩大不同层次学校的学科数量和队伍规模,同时加强内部制度性支持。

民俗学如何融入新文科建设

林继富^①

(中央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北京 100081)

三十多年来,我个人始终在民俗学和民间文学调查研究、学科建设的第一线。2018年8月份,中共中央提出高等教育要努力发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这些不同学科的“新”,不仅是适应新时代的新形势,而且在新学科内涵建设上展现出新气象。其中的“新文科”概念,当时我非常不理解,不知道何为新文科,更谈不上建设新文科了。新文科

^① 林继富(1964—),男,湖北麻城人,教授,主要从事民俗学、民间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建设似乎跟我没有关系,我也不是特别关心这个事情。

2021年,教育部开始推行新文科的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的申报、评审,并且立项了一批新文科建设的项目,正式拉开新文科建设的序幕。许多学科都在讨论新文科背景下的建设方略、建设内容、建设目标等,大家对新文科建设发展理念、专业优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重点领域的分类推进、师资队伍建设、特色质量文化建设、新时代的新文科的研究实践等话题展开了广泛的研讨。我认为,进入2021年,新文科从概念提出走向实质性的实施阶段,也就在这个时候,我才觉得教育部开始要动真格的,要对我国大学的文科教育、文科学科进行“伤筋动骨”的改革。这个时候,我不能置身事外了,我也不得不去思考民俗学学科的建设问题,尤其是我所在的中央民族大学民俗学学科建设与新文科建设关系问题,其根本就是中央民族大学民俗学如何融入到中央民族大学的新文科建设之中。2021年11月2日,教育部办公厅公布了首批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许多项目都关涉民俗学,比如中央民族大学的“民族学、社会学、考古学交叉培养复合型人才的创新与实践”“新文科民族学专业建设改革与发展研究”等项目,这些新文科建设民俗学就不能不管了,也不得不融入其中。那么,民俗学怎么融入新文科建设之中呢?我会思考这个问题。

刚才,很多学者都提到新时代背景下创新发展文科教育的一些要求,也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具体要求。我觉得,新文科建设应聚焦人才培养,推进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专业质量、课程质量、教材质量,构建世界水平、中国特色的文科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文科伟业。

新文科建设的核心理念和具体目标就是交叉融合。民俗学是民众生活实践,是多层次、多元化传统知识,是具有整体性、系统性和交叉性、融合性的文化生命体。民俗学既是历史学,又是现代学,在此基础上,培育和形成了许多学科和学科理论体系,历史上很多国家都出现了以民俗知识为对象的学科和学科理论。同时,许多学科也介入民俗学的研究、调查。我认为,民俗学是最具有新文科特性的学科,民俗学融入新文科,不仅显得畅通,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了。新文科建设具有唤醒、激活民俗传统知识和民俗学学科本源的的特质、力量,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方面。

目前,我国学科门类共有十四个,包括这两年建立的交叉学科门类。民俗学属于法学门类的社会学一级学科下面的二级学科。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民俗学在中国文科学科体系中属于比较基础性的学科。

在这样的学科格局中,新文科建设如何体现、呈现、表现民俗学的新,即新格局、新发展、新担当?在多层次的基础性的学科里面,民俗学怎么去呈现新?我认为,民俗学融入新文科,应该顺应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顺应新时代高等学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哲学社会科学改革。民俗学融入新文科建设是跨越式的,也是接续式的学科建设问题。

我这里提到民俗学融入新文科建设,并不是将民俗学融化在新文科建设里面。如果民俗学融入新文科之后被融化了,也就是说民俗学被其他学科化掉了,新文科里面找不到民俗学的身影,没有民俗学的位置,那就是失败,不仅是新文科建设的失败,更是中国百年来民俗学学科建设的灭顶之灾。民俗学融入新文科建设,也不是混入其中,如果是这样的话,民俗学就会被其他学科看不起,这是捣乱的行为,会引起新文科建设的混乱。

我认为,民俗学融入新文科建设应该是有序的,就是坚持以人才培养为中心的科学发展理念,有规律、有步骤地融入其中。民俗学融入新文科建设,并不是与其他学科进行随意的拼盘,不是把几个学科拼在一起,毫无规律,毫无逻辑,也不是简单的中文、历史、哲学、艺术等课程的拼盘。民俗学融入新文科建设的重要性、实践性效果不能比现在作为二级学科在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和服务社会上表现得还差。如果是这样,民俗学融入其中就糟糕了,即使融进去,也是一种失败。

民俗学融入新文科建设应该在多个层面进行,比如,民俗学与文史语哲学科融通,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融通,与其他自然科学包括医学、大数据的管理和应用、区块链的信息科学等学科融通。民俗学融入新文科就是以不断的方式,在不同层级展开。

民俗学怎样融入新文科?我认为以下四点比较重要。

第一,融入民俗学的思想建设,在新文科思想建设中,突出民俗学在新文科理论体系中的重要性。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应该多阐释、多研究中国民俗学的思想,认识到民俗学学科思想对其他学科的贡献,形成新的理论研究范式。这种新的研究范式,不仅是民俗学自身理论的研究范式,而且是民俗学对于

新文科理论范式结构的独特贡献。

第二,融入民俗学学科建设,强化民俗学在新文科建设中的学科、学术担当,建构民俗学在新文科建设中的学科框架。新文科建设中的学科体系框架在哪里?民俗学应该也必然能找到相应的位置。比如新文科建设里的教材建设、课程体系建设。我们每年都要使用教材,每年都要为学生上课,这个课程体系怎么办?在新文科里面,民俗学的学科建设要进去,也应该进去,让新文科建设,无论是课程体系还是人才培养,都离不开民俗学,使其有一种依赖感。

第三,融入民俗学知识体系建设,确保民俗学学科在新文科建设中的应有位置。加强对中国民俗生活知识的调查研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回应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重大需求。比如说,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的民众生活、民俗知识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些我们当然要去关注,要调查、研究民众生活改变的内在驱动力和外在表现力。我国正在推进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等,在研究这些重大的现实问题的过程中,民俗学理所当然要有担当意识,要为政府提供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建议。比如,北师大做的百村调查,我觉得就很好,他们做的社会治理研究也很好,因为这都是国家急需的东西。只有国家需要、社会需要、人民需要,民俗学才有生命力。

第四,融入民俗学人才培养工作,保障新文科建设人才培养高地,从多层面贯彻民俗学人才培养、民俗学思想传递,让更多学生了解、理解中国民俗传统的内涵、价值和意义。学校教育、学科体系建设都是为了培养人才,培养新时代的高质量人才,我觉得这才是新文科建设的目的。我们要把民俗学的知识、思想、理论贯穿在人才培养中间,让更多的学生去接受民俗学教育,让他们更好地理解中国人的生活、中国的变化。

只有做到上述几个方面,民俗学在新文科体系建设中才能够站稳脚跟,才能够服务新文科建设,才能够更好地推进新文科建设、深化民俗学发展,使之具有独立的学科品格又兼具包容性的学科增长特质。只有这样,民俗学融入新文科建设,才是真正的融入。以正确的姿态、科学的方法融入其中,突破传

统民俗学学科的藩篱,才是民俗学在新文科建设里面要走的光明大道。

愚公移山:民俗学一级学科建设 症结问题及思考

刘爱华^①

(江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

我主要想谈民俗学一级学科的建设问题。这个问题有点大,因为大家都在说怎么确保二级学科地位,我突然提了一个这么大的话题,但是我觉得它是有必要的。

近年来,民俗学学科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纵观民俗学发展历程,可以说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在文化建设如岁时节日、社会服务如非遗保护等方面都做出了积极贡献。在学科建设方面,我们的硕士点听说有50多个,博士点有10多个,研究队伍日益壮大。2021年,中国民俗学年会收到了307篇参会论文,参会人员分成50个小组。如果没有猜错的话,这可能是目前规模最大的一次会议。还有很多方面,民俗学发展应该说成绩斐然。

但是,我还是要强调学位制度的问题,怎么让教育部认可,这对民俗学发展来说可能是最大的影响因素。

我用一个词形容,“夹缝求生”。为什么这样说?现在来看,民俗学分为两块,民间文学、民俗学。民间文学在文学的处境应该说也是边缘的,但整体上还是比民俗学好,民俗学在社会学里面实际上更加边缘化了。徐赣丽老师也说,必须按照社会学的框架去做一些事情,所以说民俗学更加尴尬。在文学、社会学两个领域,我们都没有获得应有的地位,只是人家觉得我们的研究跟他们有关联,就对我们认可一些或者说看重一点。并不是因为学科本身的地位而让我们获得应有的尊重,而是以对方为中心,并根据我们的研究能给对方带来什么而赋予我们地位。所以,遵循这样的逻辑会导致很多问题,比如课题申报、就业以及和其他学科的对话,甚至对学科认同也有一些影响。有些民俗学同仁因为得不到重视或没有相应的学科点,不得不转行了。就我来说,因为我们学校没有民俗学学科点,我现在从事文化产业管

^① 刘爱华(1978—),男,江西南昌人,副教授,主要从事非遗保护、民俗理论、民俗文化产业、传统工艺研究。

理教学,我对民俗学比较热爱,且从事民俗学研究这么多年,所以我还坚持做这块研究。

有的老师说,我们应该把自己的东西做好,我非常认同,但是我觉得仅仅做好自己的学问,提升自己的理论水平,还是不够的,学术之外的东西,其实也非常重要。我套用一句话,研究没有藩篱,但是研究者有圈子。这个圈子对个人发展影响非常大,有时候比学术本身影响还大。

我举一下自己的例子。比如说,最近我在申报职称,我在填报系统里面找不到民俗学,我找法学门类,在法学门类找社会学。社会学一级学科下有社会学、人类学,里面甚至添加了女性学、家政学,但是没有民俗学,所以这是非常头痛的事。我当时没办法,就写了人类学。还有在课题申报过程中,我也碰到了非常困惑的问题。特别是国家课题,我持续申报了八年,才中了一个,我报的是冷门绝学研究专项,是填报了交叉性学科才申请上的。我以前在申报年度项目时不知道申报书应该放到哪个一级学科,有的时候放在社会学,有的时候放在文学,有的时候放在艺术学,有的时候放在马列·科社,我对此感觉特别痛苦。别的一级学科研究人员在申报过程中更加关注的是如何打磨文本,我除了考虑打磨文本,可能更棘手的是考虑申报书放到哪个学科。我记得到了后面几年,一到申报时我就非常焦虑,申报书不知道放到哪个一级学科。我觉得这也不完全是水平的问题。多年前与同事的一次偶然谈话对我刺激非常大,一个同事说省社科项目申报很容易,他的硕士论文随便一修改就申报成功了。这对我刺激很大,因为我用博士论文申报,改了五年才申报成功,当然,这里有很多原因不便展开。

我们需要修炼内功,但也离不开勤习外功。研究者都有圈子,如果你不是社会学圈子的人,那么在课题申报、人才称号等方面都会受到影响,因为那个圈子里面没有你熟悉的人,不会给你投票。我知道不少单位,他们申报国家课题就很重视圈子经营,平时讲座就会请相关专家,申报课题时如果有老师通过通讯评审了,就去做“公关”工作。我申报的国家社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好在有一个交叉学科,否则我也不知何年能申请上。所以,这个圈子对我们的发展影响很大。

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建设民俗学一级学科而不是二级学科,才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思考:民俗学到底应该怎么发展,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民俗学是什么?

很多时候跟同事聊天,人家不知道民俗学是什么,所以,我们应该思考民俗学到底是什么?民俗学有什么问题?我也是抛出这样一个问题,让大家一起思考,也算是一个引言。

我们的学科影响力怎么样?我们在学界和其他相邻的学科来比差距多大?很多学者谈到共同体意识,我觉得我们的共同体意识还应进一步加强。我们的理论阐释力,比如说对于社会发展的热点问题,民俗学学科怎么融入时代主题,还有学科对话这一块,都应加强。民俗学学科发展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我个人观点是教育体制认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艺术学的发展。我在知网上搜了“学科建设”,以民俗学作为篇名的论文有28篇,以艺术学为篇名的有145篇,这有学科大小的关系,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对学科建设的关注度。

我想跟大家稍微谈谈艺术学的发展。艺术学发展离不开张道一先生的努力,他在这个过程中做了很大的贡献。比如在《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艺术学已成为文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学者如张道一、仲呈祥、于润洋、李心峰等,对艺术学的发展做了持续努力。艺术学的产生是20世纪二三十年的事,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艺术界才真正重视并致力于学科建设。张道一先生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当时中国没有“艺术学”的叫法,目录中也没有艺术学,只有“艺术历史及理论”,隶属于文学。张道一先生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做推动工作,找了很多知名学者签名,直到1990年,艺术学成为文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下面有很多二级学科。1997年,它还是文学门类下四个一级学科之一。到了2011年,它就独立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门类,它下面有5个一级学科,实现了艺术学科跨越式的大发展。

我举这个例子,想说明什么?艺术学确实跟民俗学不同,有它的独特性,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东西值得借鉴。比如艺术学学科之间的差异性非常大,远不止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的差异。音乐、舞蹈、戏剧、影视、美术之间,其实对话是比较难的,即便这样,它却得到了迅猛发展。1992年,艺术学只有20多个硕士、博士点,到了2011年,就有了130多个硕士、博士点。由于学位制度上的突破,学科发展非常快。

鉴于今天的发展形势,民俗学要不要考虑建立一级学科的问题?有一句古话,“不谋全局者不足以

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民俗学、民间文学成为二级学科,当然值得祝贺,但是如果从长远发展来说,只局限于二级学科,不利于整个民俗学学科的发展。

民俗学如何发展,学科建设到底要怎么做?我觉得应该考虑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是修炼内功,另一方面勤习外功。把我们自己的事做好,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包括新文科背景下民俗学如何跨界。民俗学一直就没有把自己局限在民俗学,它和人类学、艺术学、民族学都是交融的,所以我们肯定要修炼内功。修炼好内功的同时,我们还要勤习外功。怎么勤习外功,如何去做,我觉得还是离不开共同体的持续奋斗,我们需要一种愚公移山的精神,大家一起努力。

我简单提一下具体措施。第一是顶层设计,让我们知道民俗学到底怎么走、怎么发展,发展方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第二是壮大学科,我们的影响力要扩大,包括学科点、研究队伍的壮大。第三是融入主流,也就是说,民俗学学科如何和国家的重大发展战略结合起来,融入其中,参与国家文化建设、经济发展,提升理论阐释力。第四是上下合力,也就是说,每一个学者、每一个学位点都要努力,还要勤习外功,经营圈子,包括一些有影响力的前辈,团结起来,上下合力。第五是增强认同。

民俗学的实践派与学院派两大传统

王霄冰^①

(中山大学 中文系,广东 广州 510275)

民俗学从建立之初就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实践民俗学的传统,一个是今天比较占主流的学院派的传统。其实,实践民俗学的传统更加悠久,甚至可以上推至现代民俗学学科建立之前,即历代参与到国家移风易俗的社会文化建设当中的风俗学说。

在欧洲,民俗学创立之初其实也是走的实践派的道路。我们知道,德国的民俗学有两大思想根源,一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而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潮,一是与此密切相关的,同一时期的浪漫主义文学潮流,所以,德国最早的民俗学家们都非常积极地投身到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文化建

设活动当中。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南也自称是一个在野的民俗学家,他的学问是用来经世济民的。在美国,则有公共民俗学这一支,也是一批活跃于民间的民俗学家,用自己的智慧帮助社区和民众共建美好生活。在中国,当前也有很多民俗学家主动参与到非遗保护运动当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知识和力量。我认为,上述这些都代表着民俗学的实践派的传统。

近年来,国内一些民俗学家正式将实践民俗学提上了议程,但到目前为止,基本上还停留于理论号召的层面,还没有进入实施和推广的阶段。下一步,我觉得应该先好好地总结一下上述的实践民俗学传统,梳理这一支民俗学的学术史及其理论方法,然后将这些理论和方法广泛地应用到研究实践当中。

也就是说,民俗学要两条腿走路。一条腿就是学院派的民俗学,带有人文科学的特色。钟敬文先生说过民俗学应包括三大部分,一个是理论的,一个是历史的,一个是资料的。这个概括我觉得到今天都还不过时。

首先,我们在理论研究方面要继续推进,建立民俗学的学科体系和理论方法。

其次,在历史的深度上,我觉得民俗学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有很多功课要补。当然,在座的好多老师,像萧放老师,在历史民俗学方面很有造诣。但是,我觉得萧老师开拓的历史民俗学研究的传统,在今天的民俗学界其实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中国有很多历史民俗学资源,如果我们真正去挖掘和研究的话,甚至可以说孔子就是最早的民俗学家。在孔子之前,周代的采诗官们当然更是民俗学家。孔子编选《诗经》,难道不就是一个对诗歌民谣进行研究的過程吗?还有历史上像朱熹这样的哲学家,其实也是民俗学家。朱熹的《家礼》就是在对传统礼仪文化进行研究和总结的基础上完成的,是“礼”的民间化尝试。当然,和历代礼学家一样,他的著作带有理想化的色彩。还有像欧阳修和苏轼这些文学家,在古代族谱文体乃至家族文化的形成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这些学术史资源进行研究和整理,是历史民俗学的重要任务之一。

最后,资料方面,我最近提出了建立“民俗资料学”学科分支的观点,就是要借鉴史料学、文献学、文

^① 王霄冰(1967—),女,浙江江山人,教授,主要从事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研究。

物与博物馆学、图书馆学、信息科学等的理论与方法,从民俗学的学科需求出发,着重研究民俗资料的搜集整理、分类属性、保存利用等问题。这里的民俗资料,意指一切能够为民俗学研究提供有效信息的文字与非文字资料,包括文本、图像、文物和影音资料,等等。民俗资料学和历史民俗学有交叉,但并不完全重叠,主要还是视角不一样。历史民俗学重在复原和重构民俗史和民俗学史,而民俗资料学主要着眼于资料以及资料的处理方法,二者的关系也许有些类似于历史学和史料学、文学和文献学。我们课题组最近也在组织一个系列讲座“民俗资料学:历史、理论与方法”,在场的很多老师都给予了我极大的支持。

新文科建设除了跨学科这一特点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彰显中国气派和中国传统,建立我们自己的文科体系。这对于民俗学来说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发展契机。因为同样是研究生活文化,民俗学的中国立场一直都是最坚定的。相比之下,人类学可能更多的还是注重与西方的学术传统对话;社会学更不用说了,完全就是一种舶来的学问。现代民俗学学科虽然也是西方人建立的,但是我们拥有非常深厚的民俗学研究传统,所以在新文科建设中,民俗学应该充分发挥这方面的优势,更自觉地彰显中国气派、中国立场、中国传统。这和我刚才说的,需要更深入地挖掘历史的学术资源,也是完全契合的。

在与其他学科的对话方面,民俗学也可以跟很多学科形成对话。因为我们研究的东西,即民间文化和生活文化,涉及到政治、经济、法律、社会、历史、宗教、医学、文学、艺术、体育方方面面。一切文学艺术的源头其实都是民间文学艺术,所以研究文学艺术,就会涉及到民间文艺。而口头叙事、口述史,还有集体记忆这些东西,本来就是历史意识形成的基础,所以,民俗学所做的记忆文化的研究也完全可以和历史学形成对话。宗教学更是如此,民间信仰其实就是宗教的基本形式或者说初级形式,很多宗教学理论都是建立在对民间信仰或原始信仰的研究基础之上的。在经济学领域,民俗学所研究的传统的经济形式,以及沉淀在民众心理层面的一些根深蒂固的消费习俗与观念,包括民众生活中最基本的经济意识,其实都可以为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提供参考。同样,我们也可以将民间的视角和来自民间的丰富资料带入到医学、政治学、法学、艺术学、体育学等研究当中,与多学科展开合作与对话。

当然,要做到以上几点,最根本的还是要扎稳自己的马步,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有的时候不用去求别人,别人也会来求我们。我们扎扎实实地把自己的理论研究做好了,历史研究做好了,资料研究做好了,那么,很多学科自然而然地就会关注我们,希望跟我们建立联系。

那么,具体来说,新文科建设中我们这个学科可以有什么作为呢?在我的印象中,新文科建设是以项目为主打的。真正以新文科建设为由去设立一些新学科的成功案例,好像还没怎么听说。也许非遗学可以算是一个。非遗学有可能成为新文科建设中的一个幸运儿,把自己建设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其他学科好像还没有什么动静。各个高校更多的还是以项目的形式建立学科间的横向合作,就像北师大文学院的杨利慧老师,就利用这个契机实实在在地做了一个项目,编印了一套《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术精粹》。北师大在这方面走在了前面,值得我们学习。民俗学学者今后应该积极把握这样一些机会,参与到各校的相关项目中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甚至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

民俗学应该关注我们这个星球,关注地球的平安、人类的福祉。这其实就是实践民俗学所要追求的目标,虽然我们研究的是很通俗、很普通的东西,但是我们的格局可以更大,目光可以更高远,胸怀可以更宽广。平时我经常跟学生说,民俗学是一门特别重要的学问,因为它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福祉。民俗学最终的目标是追求美好的生活,让社会中的所有人都有幸福感和安全感。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民俗学学者必须在社会中起到沟通上层和下层、官方和民间、精英和民众的作用,因为国家的政策、精英的思想和上层的设计,往往都必须经过一个民俗化的过程,才能被社会各阶层所接受,才能取得良好的社会效应。就以当前国家提倡的中小學生“双减”政策为例,顶层设计非常好,但是一到了民间,就变成了苍白的口号,很多家长反而因此变得更加焦虑,各种变相补课、“密考”应运而生。在很多学校,学生的压力丝毫没有减轻,老师仍然通过各种隐蔽的方式超纲教学、布置过量的作业。为什么?实际上这就是个民俗问题。因为家长都有着根深蒂固的“望子成龙”“学而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等观念,都希望孩子能够通过学习和考试出人头地,改变个人和家族命运,都不希望孩子落后于人,将来上不了高中和大学,从而成为体力劳动者。这些都和传统的等级观念、攀比心理有着

密切的联系,与现代社会自由、民主、平等的价值观是完全相悖的,但这种长期以来养成的观念和习惯一时很难改变。这个时候就需要民俗学家站出来,帮助国家去想办法,通过“日常生活的启蒙”,让民众认识到自身行为背后的观念误区,逐步改变思维方式,从而更理性地面对子女升学与教育问题,积极配合“双减”,让国家的政策最终能够在民间得到有效的推行。与此同时,民俗学学者也有义务把民情和民众的诉求及意愿反馈到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层面。这样,既有利于国策的推行,又能让万千家庭尤其是少年儿童真正从中获益,从而极大地提高全体国民的幸福指数。这岂不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建设中 的民俗学规范

向柏松^①

(中南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近几十年来,民俗学重要的实践活动之一是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的建设。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基层群众文化艺术活动的繁荣发展,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文化和旅游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及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先后设立了以“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为名的地方特色文化品牌项目。文化和旅游部从1987年开始设立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截至2014年,在全国范围内命名“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963个。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从2003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命名“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截至2018年3月,共命名该类品牌478个(含基地)。多年来,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品牌的创建、评审与命名活动,有力促进了中国民间文化艺术的传承发展,丰富了农村群众文化生活,推动了地方文化产业的开发及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建设的对象,几乎都属于民俗文化的范围,因此,要推动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建设健康有序地发展,必须要用民俗学的理论作为指导。其中关键性问题是管控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建设的范

围,即必须始终坚守民俗文化在文化艺术之乡建设中的核心地位。

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的内容和范围,经历了逐渐扩大的历程。1987~2003年,文化和旅游部在全国命名了486个“中国民间艺术之乡”和“中国特色艺术之乡”,将这一项目最初的范围界定为民间艺术或特色艺术。2008年,文化和旅游部制定并颁布了《“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命名办法》,正式定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将艺术之乡扩充为文化艺术之乡。2011年,文化和旅游部重新制定了命名办法,对“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名称进行明确界定:运用民间文化资源或某一特定艺术形式,通过创新发展,使其成为当地广大群众喜闻乐见并广泛参与的群众文化活动形式和表现形式,主要指县(县级市、区)、乡镇(街道)。2018年,文化和旅游部颁布《“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命名和管理办法》,进一步明确界定“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是指经文化部命名,具有某一特色鲜明、群众喜闻乐见并广泛参与的民间文化艺术,并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的特定区域,主要指乡镇(街道),也包括部分县(县级市、区)”。至此,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的概念更为明确、清晰,其范围既包括民间艺术,也包括民间文学,还包括民间文学艺术以外的民间文化。这表明,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经过二三十年的建设,其内涵和外延已经得到大幅度的拓展。这种拓展应该有一个范围的限制,不能随意超越以民俗为中心的范围,这就需要我们运用民俗学理论去加以规范限制。

其一,民间文艺之乡与民间文化之乡。最初,文化和旅游部设立的命名范畴,侧重于民间艺术门类,后来逐渐扩大到文化领域,涉及的内容更为丰富多样,所以将艺术之乡改为文化艺术之乡,在“艺术”前面加上“文化”二字,表明品牌项目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艺术领域,而是扩大到整个文化领域。2011年,文化和旅游部颁布《“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命名办法》,将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分为表演艺术、造型艺术、民间技艺、民俗活动四大类别。实际上,这四大类别都属于民俗学范畴。2018年1月4日,文化和旅游部又颁布《“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命名和管理办法》,称“本办法所称民间文化艺术,涵盖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杂技、民俗、体

^① 向柏松(1956—),男,湖北建始人,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创世神话与民间信仰文化研究。

育、游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也包括当代兴起的其他文化艺术形式,如摄影、合唱、油画等”。从中可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建设的内容已由传统民间文学艺术门类扩张到现代文学艺术门类,甚至不仅仅是文学艺术门类,也包括其他文化门类。如2010年9月14日河北行唐县被命名为红枣文化之乡;2012年12月17日江苏省扬中市被命名为河豚文化之乡,2013年5月19日云南省宣威市被命名为中国火腿文化之乡,2013年6月26日吉林省抚松县被命名为中国人参文化之乡等,这些文化之乡的内容多属于物质文化,超出了民俗文化的范围。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由民间文学艺术的范畴扩大到民间文化的大部分领域,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由局部蔓延到整体的规律显现。但是,尽管有了这样的发展,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的核心部分或主体部分仍然应该是民俗学范畴的民间文学艺术。体现在全国各类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所占比例上,民间文学艺术应该占据绝对多数的份额。

其二,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早期民间文化之乡的命名,主要对象为传统民间文化,后来逐渐纳入了现代文化。这似乎有悖最初传承传统民间文化的初衷,其实不然,这正表现了传统文化传承的发展趋向。传统文化是指中华民族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中华传统文化是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与物质文化的总体表征。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传统文化必然在发展中创新,并在吸收外来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实现现代性的转换,从而形成现代文化。现代文化主要指由传统社会向经济富裕、政治稳定、科技发达的现代社会过渡中形成的文化。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可见,将现代文化纳入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建设的范围,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如沈阳市沈河区中国摄影文化之乡,上海市宝山区顾村镇中国诗歌文化之乡,黄冈市黄州区中国现代绘画文化之乡,秦皇岛中国葡萄酒文化之乡,东海县中国水晶雕刻艺术之乡等。这些文化艺术之乡,虽具有现代内容与形式,但与传统民俗文化也还存在根脉相续的关系。今后,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现代文化不断进入民间文化之乡建设的范畴,但是,民间文化之乡的建设不能偏离传统民俗文化的主航线,必须在继承传统民俗文化的基础上,吸纳现代文化,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融合。因此,缺少传统民俗文化基因的纯粹外来的现代民

俗文化事象,比如西方涌进的洋节之类,就不能列入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建设的范畴。

其三,民俗文化与精英文化。民俗文化是人民群众集体创造的,立足于民众生产生活背景的自娱自乐的文化形态,古往今来不断传承发展,是一种区别于精英文化的存在。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命名伊始,主要立项的对象是民众喜闻乐见的民俗文化,但是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融入了上层精英文化。怎样看待这种现象呢?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芮德菲尔德在其《农民社会与文化:人类学对文明的一种诠释》一书中提出了“大传统”与“小传统”的理论,大传统对应精英文化,小传统对应民俗文化。芮德菲尔德解释说:“在某一种文明里面,总会存在着两个传统:其一是为数很少的一些善于思考的人们创造出的一种大传统,其二是由为数很多的,但基本上是不会思考的人们创造出的一种小传统。大传统是在学堂或庙堂之内培育出来的,而小传统则是自发地萌发出来的,然后它就在它诞生的那些乡村社区的无知的群众的生活里摸爬滚打,挣扎着持续下去。”罗伯特·芮德菲尔德对小传统轻视的态度姑且不论,他对社会文明两个层面的分析还是颇有道理的。他还揭示了两种传统之间的关系:“这两种传统——即大传统和小传统——是相互依赖的,这两者长期以来都是相互影响的,而且今后一直会是如此。”他又说:“我们可以把大传统和小传统看成是两条思想与行动之河流,它们俩虽各有各的河道,但彼此却常常相互溢进和溢出对方的河道。”据此可知,民俗文化与精英文化是相互渗透又相互对立的统一体。一方面,精英文化要吸收民俗文化的营养以使自身得到滋补,另一方面,精英文化要影响民俗文化,将精英层面的观念化为民众的通俗活动。所以,在文化之乡建设过程中,一部分传统精英文化之所以被采用,是因为这部分精英文化已经渗透到民间,转化为民众世俗的活动,成为带有精英色彩的民俗文化。如儒家的孝道思想,本属于精英文化范畴,但是由于统治阶层及儒家学者的长期倡导,已经深入人心,沉淀于民众的世俗活动之中,成为世俗生活的仪式和准则,所以孝道文化被纳入民间文化之乡建设的范畴。类似的文化品牌还有河南民权县中国庄子文化之乡,河南鹿邑县中国老子文化之乡,河南鲁山县中国墨子文化之乡等。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建设向精英文化的扩张发展,自然有其演进的逻辑性,但是,民间文化之乡建设的主体仍然是民俗文化,这是由民俗文化的民间性决定的,也是由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的建设初衷决定的。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建设的初衷是要传承发展优秀的民俗文化,丰富广大基层群众的文化生活,保障基层群众基本的文化权益,所以,在引进精英文化、打造民间文化之乡的过程中,必须严格控制数额,把守精英文化大众化、通俗化、生活化的底线。

民俗学的整体研究观和新文科思维

——以《中国民间文学大系》附记编撰为例

詹娜^①

(沈阳师范大学 社会学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4)

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是学科发展中必须面对的两个重要问题,学术研究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和前提,学科建设是学术研究的引领和导向。在新文科建设进程中,民俗学学科作为一门传承历史、关注当下、阐释生活、探寻未来的知识生产活动和阐释话语体系,在大力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增强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的时代背景下,更应该适应时代需求,重新审视和建构学科的顶层设计,在梳理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的历史脉络中探寻新的研究范式,进而提升民俗学学科的解释力和参与力,使其真正成为“民之学”和“学而为”的一门学问。

“新文科”这一概念是在2018年提出来的,与旧文科相比,新文科在教育背景、培养方式以及培养目的等方面都有明显不同。新文科的出现,一方面是为了适应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技术等新技术,另一方面是为了回应树立文化自信、创建中国特色哲学理论的国情时代需求。在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上,新文科特别注重学科之间的交叉,包括文科内各学科以及文理科之间的交融,进而推导出知识在应用中生产、知识为未来而生产的知识生产新模式。在以目标为导向的教育理念下,新文科强调回应社会和国情发展需求,立足中国特色,培养创新型人才,追求人才培养的卓越性和社会服务的创新性。

反观民俗学的产生历史和研究取向,可以发现,民俗学的研究理念与新文科思维多有相通和一致之处。民俗学自产生以来即强调跨学科、多专业的交叉互动,要想对一个民俗现象做出最切合民众的阐

释,常常需要有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人类学等相关知识背景。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民俗学由事象研究向整体研究转变的过程中,整体研究理念越来越成为民俗学学科的标志性研究范式。代表性成果有高丙中的《民俗生活与民俗文化》,巴莫曲布嫫的《田野研究的“五个在场”》,以及表演理论的引入和运用等。民俗学的整体研究取向不仅关注文本、传承人等民俗事象的本体,还强调对讲述空间、讲述场域、研究者、听众等民俗事象的外在场域进行把握和关注,即将民俗事象放回其生活本源当中,关注民俗事象背后的地方性知识体系及其建构。

从这种意义上看,民俗学整体研究视角和新文科交叉思维具有一脉相承、异曲同工的特性。当下,新文科工程的提出又给了我们重视审视民间文化、唤醒民间文学研究本源、激活民俗学知识研究的一种契机和引领。仅以《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的编撰工作为例,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共同颁布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同年,为了响应中央部署实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由中宣部牵头,中国文联组织开展了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意在将民间流传的能够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各类口头文学搜集出版。大系共分神话、传说、歌谣、史诗、故事、长诗、说唱、小戏、谚语、谜语、俗语、理论等12个门类,各卷的编撰阶段性成果也正陆续出版。这种自上而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对民间叙事文本进行广泛搜集和整理的工作在建国以后还有一次,即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国家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发起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普查活动。全国各地民间文艺工作者及民间文学爱好者积极参与,编纂、出版了大量采录于田野的民间故事集成、民间歌谣集成、民间谚语集成县、市及省卷本。

与三套集成相比,民间文学大系工程在重要意义、指导原则、基本思想、总体目标、文本选择的原则与标准等方面均有不同,时代性突出。例如,大系的编撰原则是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收录作品以科学性、广泛性、地域性和代表性为原则和标准。在编撰体例上,以故事和传说卷为例,除对每则文本的采录时间、地点、讲述人、采录人、文本来源等做好说明,还要撰写一定数量的附记,这是大系编撰的一个重要导向。所

^① 詹娜(1978—),女,辽宁本溪人,教授,主要从事民俗学、文化社会学研究。

谓附记是对文本中涉及到的地方性历史、宗教、信仰、民俗,包括特定的风物、历史人物等进行说明。例如,在辽宁西部喀左蒙古族地区流传的《四十八旗王爷的来历》,讲的是努尔哈赤从李成梁手下逃出后与四十八个蒙古族人一起挖参创业。努尔哈赤在弟兄们的扶持下创立大金国,封四十八个蒙古族弟兄为四十八旗王爷。在这则附记中,可以对努尔哈赤的生平、战绩以及民众评价等做出一定的注释。满族传说《新娘为什么要跨马鞍》附记可以对满族婚礼的仪式程序、信仰心理等传说中没有提到的部分进行交待和说明。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为什么要撰写附记?设计附记的初衷和意义是什么?从内容上看,附记所表现的主要是文本中无法表达的地方性知识,没有这些地方性知识的积累和储备,阅读者和听众很难理解文本所传达的文化信息。可以说,附记是理解民间叙事文本的说明书和注释本。为什么在21世纪20年代的当下,人们在接收和理解叙事文本时需要说明和注释?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是当下的听众与叙事文本之间产生了巨大的隔阂。表面看这是叙事文本和听众之间的隔,实质是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农村和城市、我文化和他文化、我区域与他区域之间的信息隔、文化隔与心理隔。在民俗学的课堂上,我曾讲述过一则东北地区非常有代表性的精怪故事《刷子头成精》,大致内容是货郎到农村卖货,一位姑娘选了两朵花,说好回屋里取钱却迟迟没有回来。货郎到家里查看并无此人,最后发现木栅栏的一个刷子头上面插着两朵花。在讲到这段文本时,学生们的反应大多茫然,认为不可置信。个别感兴趣的同学还会问,故事到这就结束了吗?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反应?追根结底就是叙事文本存在的语境和当下听众生活的传承空间之间产生了隔离。在传统社会,讲述者和听众拥有共同的生活经历,存储共同的文化信息,他们对中指血具有灵性、动植物可以变幻成精灵的信仰达成共识,这样的叙事文本讲到结局处,听众和讲述者大多心照不宣,心领神会。但因为时代背景、文化观念、生活空间等发生了变化,现在的听众无法对传统文化土壤孕育出来的叙事文本进行解读和理解,他们需要一定的媒介和桥梁,才能体会文本的价值和意义。此时,附记就是对地方性知识的还原,对讲述内容发生空间的还原,甚至也可以理解为对民间叙事在当下传承语境中的另类说明。在大系故事卷的编撰中,专家组还要求对一些采录条件比较好的故事文本做立体采录,用记录讲

述过程、插话对话、录音、影像、图片或者二维码的方式,全方位地还原叙事讲述的具体场景和发生情境。这种对民俗事象背后深层文化信息的整理和挖掘,是民俗学整体研究取向的具体落实和操作,不仅可以全面地记录叙事文本的讲述场域和地方性知识,更能帮助当代读者全面而准确地理解文本所传达的文化信息,也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推动与继承。

所谓新文科,应该是在旧文科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基础上完成的。建设中国的新文科,不仅需要符合当下的时代发展趋势,顺应国家发展的战略需要,还要遵循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固有特点。民俗学研究也要在时代洪流中,在新文科思维的引导下,探讨新的研究路径。

第一,研究方法的技术化。民俗学学者要有面临新挑战的决心,不断接收、适应和认同各种技术,利用互联网、数字化、影像化、虚拟现实、信息可视化等技术手段,实时洞察社会热点,深度解读民俗事象的演变规律及民俗心理的质性特征。

第二,研究内容的跨学科化。尽管民俗学有交叉研究的学术传统,但在未来的学科建设中依然要打通学科间的壁垒,扩大学科间的交融。以问题意识和目的导向为路径,打造跨学科建设科研团队和科研平台,是新文科背景下学科发展的必然选择。

第三,研究成果的应用化。民俗学作为眼光向下的学问,关切社会现实,回应社会需求,一直是学科发展的动力和追求。在当前社会背景下,如何对传统民间文化进行挖掘、梳理、外化、凸显,进而完成资源性转化和利用,是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的重中之重。以研究民间知识和民众智慧为己任的民俗学学者,理应发挥学科传统优势,开展智库建设,助力区域经济和地方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第四,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规范化和清晰化的顶层设计,民俗学亦不例外。国内有民俗学学科建制,开展相关研究的高校和学术机构数量有限,且表现出发展极不平衡的特点。诸如北师大、社科院、山大、北大等学科建设历史长、研究团队实力突出、研究成果示范性突出的高校和学术机构,首当其冲应做好学科发展的发展规划和顶层设计。地方院校则可结合自身实际开展教学研究,修炼内功。各高校和研究机构各守其位,各履其职,以高音领唱和低音共鸣的形式,携手推动民俗学学术共同体的建设与发展。

新时代 新文科 新民俗学

张勃^①

(北京联合大学 北京学研究所, 北京 100101)

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特别是高校人文社科领域正在积极推进新文科建设。2020年11月,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工作组主办的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研究了新时代中国高等文科教育创新发展举措,发布了《新文科建设宣言》,对新文科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新文科建设正式从概念提出迈向行动实施阶段。讨论新文科背景下民俗学的学科建设,首先要理解为什么要进行新文科建设。我认为这是新形势对高校的新要求。

一方面,中国已处于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是中华民族实现强起来的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另一方面,我们身处的世界和人类社会变得更加复杂。《新文科建设宣言》也明确指出:“新科技和产业革命浪潮奔腾而至,社会问题日益综合化、复杂化,应对新变化,解决复杂问题,亟需跨学科专业的知识整合,推动融合发展是新文科建设的必然选择。”^②可以说,新时代需要高等教育肩负新的使命。

国家对于高等教育的使命或职能定位是根据时代发展变化的。1998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5条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31条规定:“高等学校应当以培养人才为中心,开展教学、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2017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提出:“高校肩负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使命。”^③文化传承创新和国际交流合作成为高校的新使命。这种变化无疑是对新时代提出的新要求的一种回应。

新时代,不仅需要高等教育机构肩负新的使命,同时也需要其提升不负使命的能力和水平。新文科建设就是提升能力和水平的先进理念和有效路径。新文科强调文科间打破学科的专业壁垒,推动文科专业之间的深度融通、文科和理工农医的交叉融合,甚至包括学科和非学科之间的联动,并且融入现代信息技术来赋能文科教育,从而拓展学科发展的视野和空间,增强服务国家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新文科理念代表着一种面向现实世界、聚焦解决问题的研究和教育,它是一种超学科的理念,不仅仅是多学科、跨学科,而且包含着学科内外的合作。也就是说,不同学科的学者和各行各业的从业者共同工作,解决现实世界当中复杂的问题。因此,在新文科建设的背景下,哪个学科能够发现国家社会发展当中的真问题,能够组织不同学科的学者联合各行业从业者解决这个问题,能够在问题的解决过程当中提供方案和智慧,哪个学科就有力量,就能得到尊重,就能获得发展。

现代民俗学本身具有交叉学科的性质,与社会学、历史学、民间文艺学、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宗教学、语言学、哲学等学科均有关系,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有天然的优势。而作为一门“以科学的态度,对历史和当代的民俗事象进行调查、收集、整理、描述、分析和论证,探求它的本质结构、特点与社会功能,揭示其发生、发展、传承、演变、消亡的规律,为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服务”^④的学问,现代民俗学自1918年建立以来,经过100余年的奋斗,已经拥有明确的研究范畴和研究方法,并在民间传承文化研究的诸多方面形成了自己的优势和特色。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的民俗学学科发展的潜力,关键在于把民俗学多年来发展形成的研究优势和国家需求结合起来,发现、提出并在引领解决新时代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或新问题上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以笔者的浅见,以下几个问题非常重要。

第一,回应当代关系之变。现在全球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尤其新冠疫情的发生使世界格局

① 张勃(1972—),女,山东定陶人,教授,主要从事历史民俗学和北京学研究。

② 新文科建设工作会在山东大学召开,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2011/t20201103_498067.html。

③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 http://www.gov.cn/xinwen/2017-02/27/content_5182502.htm。

④ 钟敬文:《民俗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7页。

的变数进一步加大。当前,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社会的关系,国与国的关系,城与乡的关系,人和自身的关系,等等,都在发生重大的变革,这就需要我们敏锐地发现、深刻地理解当代的关系之变,并且回应这些变化带来的新需求。而这不是一个学科能够解决的问题,民俗学能够在其中做出独特贡献。民俗是广大民众创造、传承和享用的生活文化,是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他者、人与自身关系的过程中形成的行为模式和心理惯习,包含着民众的智慧和处理关系的一般准则。比如,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天人合一、顺天应时、感恩思报、刚健有为;处理人与他者关系方面的慎终追远、敦亲睦族、亲仁善邻、入乡随俗;处理人与自我关系方面的珍爱生命、修身养性,等等,这些原则在面对当下的关系之变时仍然具有重要价值。具体而言,比如,面对历史上发生的瘟疫,也即当人与自然的关系十分紧张的时候,民众一方面会采取科学方法(当时的)积极应对大自然的挑战,另一方面,又特别注重加强群体内部的情感联系,增强渡过难关的信心和力量。这在我国的传统节日中有很好的体现。我国不少传统节日最初都是凶日、恶日,处于瘟疫多发的季节,因此,传统节日中有很多习俗都具有驱邪避凶的功能,比如,过年喝的屠苏酒,是由大黄、白术、桂枝、防风、花椒、乌头、附子等多味中药入酒浸制而成,具有滋补保健、防病疗疾、驱邪避瘴的功效。传统节日十分注重家庭团圆和社会关系的联络,是抱团取暖的民间智慧和典型表现。民俗学加强对历史时期民间智慧的研究,尤其关注当下的民间智慧,能够为回应当代关系之变做出重要贡献。

第二,回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问题。“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灿烂辉煌,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突出优势,对延续和发展中华文

明、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发挥着重要作用。”^①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当前的重大国策,如何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亟须解决的时代课题。民俗学研究的核心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辨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发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从新的时代条件出发,通过创造性的诠释、整合、改造等活动,赋予在传统农业社会生发的传统文化以新的形式、内涵和意义,实现其承载的核心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的新发展,从而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

第三,回应时代新人的塑造问题。新时代的重要历史任务需要与新时代要求相符合的德才兼备的新人来完成。2019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明确提出:“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提高全社会道德水平,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任务,是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迫切需要,是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②造就时代新人是新时代的重要课题。目前我国的正规教育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2020年已有普通高等学校2738所,中学77455所,普通小学157979所,此外还有幼儿园291715所。^③这些学校承担着立德树人、为国育才的重责。除了学校教育,我国还有通过日常民俗生活育人的文化传统,民俗将道德伦理和待人接物的规矩礼仪渗透进衣食住行的日常之中,使其在生活日用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民俗学能够在民俗礼俗、民间文学作品中发掘中华传统美德资源,并使其与现代文化、现实生活相融相通,塑造时代新人。

总之,在新文科背景下,民俗学学者可以放下学科生存焦虑,立足民俗学的学术优势,坚守民俗学认同,多提出一些国家社会需要解决的真问题,多凝聚、多组织其他学科学者和地方文化工作者乃至政府工作人员协同解决这些问题,在其中做出民俗学的贡献,并在这个过程当中进行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建设。相信民俗学一定会有更好的发展和未来。

①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http://www.gov.cn/zhengce/2017-01/25/content_5163472.htm。

②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 http://www.gov.cn/zhengce/2019-10/27/content_5445556.htm。

③ 各级各类学校校数、教职工、专任教师情况, http://www.moe.gov.cn/jyb_sjzl/moe_560/jytjsj_2019/qg/202006/t20200611_464804.html。

对民俗学学科发展的回顾、反思与展望

萧放^①

(北京师范大学 社会学院,北京 100875)

感谢各位同仁围绕新文科背景下的学科建设问题进行热烈讨论,有回顾,有反思,有展望,大家各抒己见,是精彩纷呈的意见表达。在这我想用三个词来进行概括:回顾、反思、展望。

一、回顾

有几位学者回顾了中国民俗学的百年历程,都强调了民俗学的初心。民俗学是研究民众的学问,是人民文化的研究。民俗学是否构成学,在民俗学提出之初就有人提出疑问,现在仍然有人提出来,这并不奇怪。有学者回顾了钟敬文先生的民俗学学科体系建构理论,讨论了民俗学学科建设跟学术的关系,民俗学学科建设跟学术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也有学者做了很好的阐释。当然,不同学者有不同的侧重。

但无论怎样,民俗学从100年之前由几位学者提倡或者实践,到20世纪30年代由一些学者提出理论,到1949年之后成为劳动人民的口头文学,再到改革开放之后恢复民俗学学会和在1998年成为国家二级学科,这个历程其实是非常艰难的。有钟敬文先生等一批前辈学者的坚持,中间有很多优秀的学者离场,在初期顾颉刚先生、罗香林先生、董作宾先生等都在里边,但是后来只有钟先生坚持下来,把它建成国家二级学科,从在野之学到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组成部分,应该说是成为了庙堂之学。

这些年来,我们看到,民俗学在成为国家二级学科之后,为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建设,特别是在民间文艺资料的收集整理、民俗生活的研究和认知、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没有哪个学科能跟国家社会文化建设贴得如此之近,没有哪个学科像民俗学这样关心普通人的生活,所以,民俗学的价值和独特的学科品格,它的功能都是无法替代的。

民俗学目前处于进一步提升时期。我们研究的

是老百姓的学问,我国是人民的国家,重视人民的社会与人民的文化,以研究人的生活文化传统为基础的民俗学学科,它的存在和发展是必然的。回顾学科建设历史,我们走了非常艰辛的路,走到今天不容易。

二、反思

不管是学问还是学科,它的完善都需要反思,有反思才有进步。

2001年11月22~24日,刘魁立先生受钟老的委托,在北师大召开了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研讨会。当时与会学者60余人,今天70余人,人数差不多,但是那个时候的学者有季羨林先生,有启功先生,有于光远先生,有冯骥才先生,等等。很多著名学者参加了这个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会。当时有一个报道,报道是这样说的,中国民俗学重建20多年间取得了显著成就。那次会议是改革开放20年之后的一个会。迈入21世纪,我国各项事业飞速发展,社会生活经历了巨大的变革,民俗文化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中国民俗学也面临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这是当时开会的初衷。就是说,经过20年的建设以后,怎么看待民俗学的一些源科学的性质问题?民俗学学科的教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怎样进一步提升到一个更符合历史发展需求的高度?为了学科的健康发展,如何调整自己的步调和格局?如何开展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工作?当时提出来要研讨这些问题,这是20年前的追求。

2001年之后,又过了20年,民俗学学科建设应该说有了长足的进步。现在全国60多所高校有硕士点,博士点有10多个,课程体系也在逐步完善。民俗学队伍实际上也做出了比较明显的贡献,特别是我们有了学术共同体。而学术共同体的建立是以学科为依托的,如果没有学科的支撑,没有人才培养,没有经费支持,是很难开展活动的。没有一个稳固的学科平台,学者就没有立足的空间。没有学科的空间,哪有学者的空间?学科建设需要人力资源,需要师资。

现在,国家讲双一流学科建设,学科建设是评估一个学科成绩的重要指标,在中国目前的体制之下,学科建设是特别重要的。我们要重视学科建设,重视目前的新文科背景,重视非遗为民俗学发展带来

^① 萧放(1960—),男,湖北英山人,教授,主要从事历史民俗学、民间文化史、岁时节日与礼仪民俗研究。

的机遇。我们需要借助这样的时机来增强民俗学师资,为民俗学研究生毕业生找到出路。当然,学科发展最重要的指标是学术的提升和社会服务能力的增强。作为学术生产者,我们在贡献学术智慧的时候,在传承社会文化和进行社会建设的时候,需要奉献更多的力量。

20年的成绩是巨大的。有非常多的学科分支在启动,比如旅游民俗学、经济民俗学,还有社会民俗学,等等。这都说明这20年其实民俗学有很大的提升,特别是民俗学的社会服务,在重大问题的发声方面,其实有民俗学的贡献。大家知道,以前媒体采访的对象一般都是经济学家,再就是社会学家,但我们看到这些年其实出现了很多民俗学学者。民俗学一个巨大的贡献,就是节假日制度的改革。给传统节日放假,是节假日制度的改革、完善,民俗学学者发声并参与其中,起了倡导与推进作用。刘魁立老师带领我们团队做了很大的贡献,这是我们为人民的福祉做出的贡献。

当然,我们也应该深入思考,应该苦练内功,要经历这个时代的淬炼,让民俗学学科、民俗学队伍成为学术的精钢,让我们的人才队伍有更好的成长。这是我们反思的部分。

三、展望

巴莫老师说,未来即现在,现在即未来。赵世瑜老师说,民俗学是传承之学。我要进一步说,民俗学不仅是传承之学,还是发展之学。民俗学可以借鉴发展社会学的观点,可以提出发展民俗学或者发展的民俗学,其实我们有很大的空间可以继续努力。

我这里有两层意思。第一,民俗学是对生活史、对生活传统的研究,我们要不断地回观研究的对象和研究的学问,看我们走过的路,看我们怎么到今天,这样才能让我们在未来走得更好。这是回观、反思。第二,民俗学是现代学,民俗学要追踪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怎么随着时代的环境、技术条件变化,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情感、价值观、生活选择发生了哪些变化。这是我们应该去做的。

正如一些老师讲的,我们不仅要关注生命个体的情感,还要关注人类赖以生存的蓝色星球。民俗

学天生就有悲天悯人的品格,我们在焦虑中不断反思,不断发展。正因为我们有这样的学术品格,学科走过了弯弯曲曲之路,至今仍然葆有生机。

看到2001年民俗学会议的签名单,我很感慨,签名单里边相当一部分学者已经走了。再过20年,我们这一批人也会离开。学者可以离开,研究者可以老去,但学科建设要永远年轻。

新文科要提出新理论,新理论特别强调主体文化建设问题、学科本位问题。钟先生在20年前的会上也强调过学科的本土性问题,还有生活实践问题。实践是民俗学一直强调的,但是新文科背景下的实践跟我们以前的实践是不是一样,我们也在思考。还有新技术,我们可以借助新的技术工具让学术研究更加精进。

在新文科背景之下,民俗学如何融入?如何保持自己的学术主体地位?如何保持清醒的头脑?历史把这一棒交到我们手上,我们如何传下去?我们都应该努力,不要把这一棒丢在我们手上。

其实,我们有时候睡不着觉,这也是一个焦虑的问题。学科环境大家都知道,处在强势学科的包围之中,民俗学是弱小的,但社会需要民俗学。我们应该如何突破,如何更温暖地前进?我想,基于学科建设的学术共同体,我们应该自觉地相互帮扶、相互温暖、相互支持。共同体要从内到外共同维护,要相互成就,成就他人就是成就自己。所以,学科建设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学科建设,就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

钟先生在晚年讲了中国民俗学派,北师大120周年校庆宣传册里还特别讲到中国民俗学派,这是北师大的一个学术贡献。我们应该在这样一个学派的旗帜之下继续努力,更加自觉地做好我们自己的工作。2001年开学学科建设研讨会时,钟先生在医院,他说:“大家应该有民族自觉,将中国精神视为命根子,将中国优秀文化视为我们的命根子,希望大家努力再努力。民俗学是一门重要的学科!”他的谆谆告诫至今回想在我们的耳边。学术共同体需要一种精神,为了民族文化遗产奉献自己,摒弃小我,少讲个人利益,多讲学术公益。

责任编辑 叶利荣 E-mail:yelirong@126.com